

## 对希特勒世界观渊源的初步探索

张连根

希特勒的世界观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因而对它的探索是研究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外历史学家对“希特勒世界观”的提法颇有争议。早在1953年，卢卡契(Georg Lukács)就断言：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是德国帝国主义蛊惑人心的哲学大杂烩，纯系美国技术在德国政治和宣传上的应用，是用来反对“客观真理”随心所欲而又内容空洞的斗争手段。①按这种观点，希特勒是一个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例如布洛克(Alan Bullock)在他《希特勒传》写道：很早以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已提出计划和目标。他后来“以惊人的毅力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些计划和目标。②历史事实证明，希特勒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尤其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消灭犹太人早在《我的奋斗》中已提出了“理论”(有些人反对用“理论”这两个字眼)根据。但是，德、英、美等国历史学家在分析纳粹意识形态时，都已使用了“希特勒世界观”这个概念。效果和动机是统一的。在分析德国法西斯罪行时，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到纳粹的意识形态。而希特勒的世界观正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希特勒的世界观。希特勒称他的世界观为“民族世界观”，并在《我的奋斗》中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民族世界观从人类种族的根本要素中认识了人类的意义。持这种世界观的人认为国家在原则上只是达到目的手段，并且理解国家的目的在于维护种族的生存。他们绝不相信种族的平等。认为彼此不同才能识别种族的高低贵贱。并由于这种认识而感到有责任按照宇宙主的永恒意志促使优者或强者获胜。要求把劣者或弱者置于从的地位。他们因而在原则上颠搞大自然的基本规律，认为这种规律适用于每一种生物。他们不仅看到种族的不同价值，而且也看到每个人的不同价值。他们从群众中个人的重要性，并以此组织群众去反对进行破坏的马克思主义。

在现代世界上，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和雅利安人的存在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雅利安人的消亡或衰微都将使野蛮的黑暗时代重新降临人间。

所以民族世界观符合自然界最内在的意志，因为它恢复了各种力量的自由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导致持续培育质量更高的种族，直至通过所取得的地球上的财富终于为优秀人种开辟自由航道，使他们得以在地球上和地球以外的所有领域从事活动。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普通的民族世界观基本思维过程中汲取种种精华，并且在考虑到实际情况、时代和具备人类资源及其弱点的情况下，把这些精华变为政治信条；当我们用这种方法把广大群众严密地组织起来时，政治信条便为世界观的最后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③

希特勒的这段自白说明，纳粹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希特勒所固有的，而是汲取“民族世界观中的精华”而产生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民族世界观，是因为它根据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把这些“精华”变成了政治信条。

民族世界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思潮。它的原文是“*die volkische weltanschauung*”。

夏伊勒 (*William Shirer*) 在《第三帝国兴亡》一书中写道，希特勒“提倡所谓‘人民的国家’。这究竟是怎么一种国家，我从来没有弄清楚过，虽然我读了好几遍《我的奋斗》，也听了元首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几十次演讲，而且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个独裁者宣称，这是他全部思想的中心之点。德文‘*Volck*’一词很难确切地译成英文。一般把它译为‘民族’或‘人民’，但这个词在德文中有一种更深刻和有些不同的意义，它有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原始社团的意思。”④在这里，夏伊勒虽然隐隐约约地感到“

”的特殊含义，但是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作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以前的德国是漫长的封建社会，诸侯割据，政治四分裂。德意志人虽然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和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但是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当时关卡林立，谈不上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范畴里，尤其面临异族的侵略，德意志人就从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尤其是古代日耳曼民族英雄诗史）来强调他们的民族特性 (*Volksstum*)。当法国大革命

命在西欧为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的时候，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都出现了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浪漫主义思潮最初出现在文学范围内，例如希勒格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 的作品反映了封建贵族对革命运动的反抗，其中最反动的甚至提倡返回中世纪，宣扬宗教神秘，例如诺瓦利斯 (Novalis, 1772—1801)。后来，浪漫主义思潮逐渐扩展到一切文化和思想领域。从浪漫主义派生出来民族 (Völkisch) 思潮，该思潮强调民族特性、种族主义和反犹，也就是希特勒的民族世界观的最早渊源。现在就从这三个方面的历史演变来加以探索和研究。

#### 民族思潮

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在德国城乡，行会等级制度以及封建领主、地主制占着统治地位。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产业革命完成了对生产方式的变革。六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从1850年的21%增加到1900年的40%，工业绝对产值增加了近六倍。与此同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由40%降到30%，但绝对产值却大大增加了。1835年，近代工厂工业、手工业工场和矿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8.7%，其他全是家庭手工业和分散的手工业工场。到了1900年，其比例达到

了60%。

德国虽然实行了工业化，但资本主义只在重工业确立了自己的绝对优势，在轻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还存在为数众多的工场手工业、传统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由于这些旧的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此中世纪的行会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起的作用。

德意志工业化，不能被理解为统一的过程。它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是通过德意志邦国的改良实现的，而且立法往往走在经济改变的前头。例如普鲁士以立法消除了工业化的障碍。哈尔登贝格按照威斯特伐伦王国的模式，在亚当·斯密的德意志门徒们的拥护下，在普鲁士实现了工业自由。巴伐利亚在1825年，萨克森不迟于1840年才宣布实行有限的工业自由。而手工业者因不断展开的工业化所蒙受的损失越大，他们就越强烈地要求恢复或保留他们以前的行会。因此，一些德意志邦国的工场手工业政策数十年间一直在工业自由和保护手工业之间摇摆不定，直到1869年北德意志同盟宣布实施彻底的、不受限制的工业自由。后来这一立法被帝国采纳了。

1848—1849年革命爆发时，金融家和企业主尚未形成阶级。而大多数城市里仍然是以手工业为主，因此无产者是由手工业帮工和行东组成；帮工们变成行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行东们由于不断机械化而日益依附于资本。在一些象1846—1847年的危机中甚至失了业。这时，帮工和小行东一起反对将他们降为

真正无产者，期望最好是由国家出面来限制机械化的发展。1848年7月，由德国经济学家温克尔布莱希（Karl Georg Winckelblech 1810—1865）主持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手工业者大会，要求取消工场手工业自由和恢复行会强制。在这次大会上，由于行东们不承认帮工是平等的会员，只准许他们有咨询权，于是帮工们在8月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要求组织行会——不过是由平等的雇工和雇主组成的行会——和实行国家对工场手工业的监督。⑤五十年代，还出现过由柯勒平（Adolf Kolping, 1813—1865）神甫组织的天主教帮工协会。柯勒平当时享有“帮工之父”的盛誉。

工业化冲击了整个中间等级，加速了城乡的阶级分化。中间等级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是德意志人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他们中间产生出了不少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教员、律师、医生等知识界几乎都属于中间等级。然而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灵。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雇用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⑥

级

然而包括农民在内的中间等~~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生存。

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⑦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强大的在国内外代表他们利益的民族国家。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各个大的民族……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⑧

德意志人为了民族的统一作了长期斗争。在推翻拿破仑统治后的维也纳会议上（1814—1815）上，德国不但没有统一，反而被分裂为三十八个邦国。因此，人们感到政治统一十分渺茫，他们只能从文化渊源和历史上共同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来表现德意志的民族性。1848年革命开始时似乎可以给德国带来统一，结果是使人们大失所望。因此，1848—1870年期间，人民中的统一呼声空前高涨。1871年，俾斯麦宣布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民族似乎达到了政治统一。但这种统一并没有给德国带来合理的社会制度。工业化给社会带来巨大动荡。各邦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要求民族的经济统一困难重重。许多人批评工业化初期的种种弊病。他们向往过去，想从中世纪汲取达到统一的力量。

十八世纪末在强调德意志民族性和批评工业化弊病中产生了浪漫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否定。德国浪漫主义思

潮中有一批人把民族 (Volk) 这个概念解释为一种“固有的本性”。人的最内在的“天性”。它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是人感情诚挚的根基，有了它人才能彼此团结一致。而这种天性却来自祖国的乡土和自然环境。与此相反，犹太人是从小部迁入德国境内的异族，他们缺乏深沉的感情和创造力。在泛神论的基础上，这些人认为，个人、乡土、民族和宇宙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部的有机联系。社会制度是外界之物，国家同民族相对立，议会同有机的统一相矛盾等。他们的这些攻击主要针对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只注重物质，不重视精神和理想。他们代表因工业化而破产的中间等级，要求维持中世纪的行会等级制度和农村田园式的生活。他们要求进行一场精神上复兴民族的革命。

1863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聚贝尔 (Heinrich von Sybel) 在他的著作《进入历史时的德意志人》中以泛神论的观点把民族和自然融为一体，认为日耳曼宗教起源于深沉而热烈的民族感。日耳曼人给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灌注了这种民族精神。

德国著名文学家冯塔纳 (Theodor Fontane) 在《勃兰登堡游记》(1862—1882) 中把普鲁士的历史、建筑、自然环境和开垦土地的人描写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以此说明民族的创造力渊源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冯塔纳的书对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慕尼黑的里尔 (Wilhelm Heinrich Riehl 1823—1897) 比他们更早阐明人和社会同自然、历史、土地等关系。他的《土地



与人》(1857—1863)在当时是一部名著。他认为,民族只有同乡土融为一体时才能体现出民族的特性。他讴歌自然环境,认为自然环境塑造了人的严肃、完整和纯朴。他以扎根于大自然的民族来反对建立在物质和机器上的文明。他反对人工创造的东西,认为人造之物并非大自然的造化,因而是无源之水。城市和工厂都是人为的结果,是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的根源。1848年星森的社会动荡和民主运动都是因为有了新兴城市出现的缘故。人们应该发扬大自然所赋予人和民族的原始本性。而这种本性则是人和民族创造文化和历史的源泉。里尔主张给每个工人一小块土地去耕作,以便扎根于大自然,避免工业化给人带来的异化。只有保持中世纪帮工和行东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避免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各种弊病。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并和大城市融为一体,威胁着民族及其生存空间。大城市是国际性的,世界各大城市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将要统治世界。

里尔在民族思潮的历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1920年,德国成立里尔协会,1935年第三帝国设立里尔基金,这些足以说明他对纳粹意识形态影响之大。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出现了讴歌农民和乡土的文学。在这种文学里,农民成了民族英雄,犹太人成了敌人,因为犹太人从城市到农村,掠夺农民的财产,使农民失去了同大自然和民族的联系。这样,农民失去了生命力,因而被置于死地。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波伦茨(*Wilhelm von Polenz*, 1861—1903)1895年发表的

小说《农民箍桶匠》就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一个农民欠了一个犹太人的债，被迫把土地抵押给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又把土地卖给一个工厂老闆，于是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一座工厂。这个农民最后上吊自杀了，两只眼睛还一直死死盯在他原有的土地上。

农民和犹太人的矛盾不是小说所虚构的，而是一种确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当时德国许多农村里犹太人做着贩卖牲口和小商品的生意，从中剥削农民；遇到灾荒，民不聊生，犹太人趁火打劫，向农民放高利贷。犹太人逼债，强迫农民拿土地作抵押。因此，农民把犹太人当作现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势力。由此可见农民协会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反犹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十九世纪，拉加尔德 (*Paul Le Lagarde* , 1827-1891) 和朗格贝恩 (*Julius Langbehn* , 1851-1907) 从理论高度对民族思潮作了解释。

拉加尔德是个中学教员，1878年发表《德意志文集》，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要求德国的统一是保持和提高生存能力的道路。而这种生存能力只蕴藏在民族和人民之中，生存力是民族统一的基础。

拉加尔德把民族当作一种精神实体，是把人统一起来的理想。当时德国缺少真正的统一，只有振奋民族精神，树立德意志人的信仰，才能达到民族的真正统一。民族性决定个人的素质。用政治手段是不可能达到民族统一的。在中世纪，风俗、习惯、传统等与人融为一体，而现代的工业社会使人异化，失去个性和生命力。只有中世纪的

会  
行等级制度加上德意志精神，才能使民族发展。

拉加尔德谴责那些主张现代化，民主以及社会经济改革的激进势力，认为只有民族负有天命，有权使用暴力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犹太人支持现代化，因而是一切领域中的敌人。他要求犹太人放弃信奉犹太教，认为犹太人鬼鬼祟祟，专搞阴谋诡计。犹太法典是犹太人进行权力斗争的武器，因此对犹太人决不能估息，一定要象消灭病菌那样加以消灭。

朗格贝恩在神秘主义基础上认为个人只有成为民族一分子才能得到再生，才具有创造力。种族概念在他的神学思想中占着重要地位。他认为种族和宇宙是同一个东西。种族精神和肉体的种种特性是大自然所赋予的，是通过血液代代相传的。人的外貌可以证明人的内在秉性，因此研究人的外貌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内容。拉加尔德还只限于宗教上反犹，而朗格贝恩则已为种族上反犹制造理论根据。朗格贝恩把犹太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德国境内长期定居的犹太人，他们仅仅保持自己的法律，所以对他们可以表示一定的容忍；另一种是外来的犹太人，他们侵入民族的机体，污染民族的血液，因此必须象对待鼠疫和霍乱那样加以消灭。

民族思潮渊源于浪漫主义，到了拉加尔德和朗格贝恩时代理论上已初具规模。它强调精神，内在力量，内在感情等来反对现代工业社会注重物质的要求。同时它又看到正统的宗教（当然也是一种精神力量）解决不了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民族思潮说明民族

承受了大自然的灵性，因而它本身就包含着通神论和唯灵论的成份。

希特勒世界观中除了具有上述民族思潮的种种观点以外，他平时流露的“天命”和“天意”思想，正是这种通神论和唯灵论的反映。

### 种族主义

十八世纪，种族学还是一门用来划分动植物和人类部族种类的科学。但到了十九世纪，随浪漫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种族学的用途往往被歪曲了。民族思潮企图借用种族学来证明外表是内在精神力量的反映，自然环境和民族精神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他们在康德那里找到某种根据，因为康德强调了地理环境对种族的影响。

人类学和语言学对种族主义的产生都起过一定的作用。早期人类学试图证明部族和民族天生存在质的区别。对头盖的测量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头盖学创始人高尔 (*Franz Josef Gall*, 1758—1828) 曾设想过，从头颅的形状来估计人的智慧和品质。种族主义者利用这点，把狭长头颅描绘成雅利安人祖先的特征。德国语言学家在研究德语和英语的渊源时，说明两个民族出自共同语系。米勒 (*Max Müller*, 1859—1861年期间给英国人讲课时假设说，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祖先雅利安人从他们的故土(相当于现在的印度)西迁，在迁徙过程中培养出自信性和独立性强的

特征。这种说法，给雅利安人这个概念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人戈平璜提出了较完整的种族理论。他认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和人类文化的盛衰全在于种族。种族的纯洁性赋予种族以生存的能力，使它有能力统治劣等种族。种族杂交导致文化衰落，民族力量的消失和种族的最终灭亡。

戈平璜认为，雅利安人是目前世界上最纯洁的种族，因而具有真正的生存能力。雅利安人的天性之一便是取得霸权和征服其他民族。在被征服的劣等种族世界里，雅利安人便是贵族。种族必须保持纯洁，民主是种族杂交的表现，因此必须绝对加以阻止。当今西德著名历史学家布拉赫认为，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变为激进的帝国主义。⑨

1894年，舍曼(Ludwis schemam)在德国成立戈平璜协会，该协会得到里夏德·瓦格纳一批人的支持。舍曼本人就是瓦格纳圈子中的人，同泛德意志协会保持着密切来往。所以戈平璜的种族理论得以在泛德意志协会中流传。1906年，泛德意志协会共有会员21,000人，其地方分会主席36%是教师。因此，种族思想能够迅速地在学校中传播。

舍曼本人是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1925年，他发表《德意志人生存之路》声称，现在有一种信念，认为大城市、机器和犹太人的解放是人类发展道路的里程碑。德意志人只有摆脱这种信念，德国的一切才能好起来。舍曼还对拉加尔德和瓦格纳大加美化。在

泛德意志协会中影响很大。尤其该协会主席克拉斯 (Heinrich Claf) 不仅是舍曼的私交，而且是舍曼种族理论的积极鼓吹者。

二十世纪初，德国流行各种反动的种族理论。戈平瑞虽然对德国有很大影响，但他还不是纳粹理论的先驱，主要由于他还缺乏时代精神和没有运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种族理论。

对希特勒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张伯伦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张伯伦 1855 年生于朴资茅斯，父亲是一个英国海军上将。最初，他学植物病理学，因身体不好，改学生物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受了瓦格纳影响后，他变成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从 1882 年起，拜罗依特成了他第二故乡，他还娶了瓦格纳的女儿埃娃为妻。1923 年，希特勒在拜罗依特拜访张伯伦，当时后者已身患重病，半身不遂。但希特勒的一番演说却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翌日，他写信给希特勒：“在德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候，它诞生了一个希特勒，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sup>①</sup>

1925 年 9 月 5 日，纳粹党机关报《民族观察家报》大张旗鼓庆祝张伯伦七十岁生日，把他的《十九世纪基础》捧为“纳粹运动的福音书”。张伯伦死于 1927 年，未及看到希特勒上台。希特勒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

《十九世纪基础》出版于 1900 年。该书特点在于把科学性巧妙地同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十九世纪兴起的人类学给张伯伦的反动种族理论披上一件“科学性和学术性”的外衣。他认为康德所

假设的“自在之物”是经验理解之外的事物。他对康德的解释是，一方面存在德意志科学，它以高度的精确决定经验中存在之物；另一方面又存在日耳曼宗教，它可以从多方面显示德意志人的心灵。从重要性说，宗教是首位，因为只有它才显示事物之本质。宗教影响人的思想，要求人用科学的方法即通过经验来证实宗教之存在。张伯伦以此说明，人通过包括德意志精神在内的心灵可以找出外部世界的意义。因此，他要求德国人用宗教式的理想去推动外部世界。

张伯伦承认科学是有用的，但又说这种用处有一定的限度，而宗教种族给人以无穷无尽的智慧。这样，他给种族这个概念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张伯伦认为，古代留下三种遗产：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罗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是两个血统纯粹的种族，处于两者之间的则是各种民族的大杂烩。犹太人是来自东方的异族，因此只有日耳曼人才配继承人类的遗产。条顿人是“我们文化的灵魂。每个民族今天作为一种生存的力量，其重要性取决于它的人口中正条顿血液的比例……只有条顿人用他们灵巧的手掌握古代的遗产时，真正的历史才开始。在条顿人中间，只有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为他们继承希腊人和印度雅利安人的最优秀品质。因此，他们有权作世界的主人。上帝完全指望日耳曼人”。①

在张伯伦的眼里，犹太人是同日耳曼人争夺世界霸权的唯一种族。犹太人虽然保持了血统的纯粹性，但缺乏内在力量，缺乏信心。

缺乏神秘性。日耳曼人已经卷入一场同犹太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不仅需要大炮，而且需要用人类和社会所能掌握的一切武器去进行斗争。

张伯伦不反对现代化。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在于现代化掌握在谁的手里。例如德国的工业如果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那么工业就损害德意志人的利益。相反，工业和其他现代化领域如果掌握在德意志民族手里，那么所这一切都会被一种向上奋发的精神所鼓舞。因此需要发动一次革命使德意志人认识到这点并以此去反对看重物质利益的犹太人。这种革命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思想革命，革命目的是把现实拿来为民族服务。

张伯伦与以往民族思潮理论家的区别在于前人提往后看，要回到中世纪去，而他则向前看，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这点比过去任何人部高明。他给反动的种族主义灌住了时代精神。

由于张伯伦所主张的只是一种思想革命，所以民族思潮接受了他的理论。《十九世纪基础》便成了民族思潮中的一本畅销书。十年内，它再版了八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其销售额已达十多万册。到1938年，印刷到第二十四版，销售数在二十五万册以上。民族思潮除了接受张伯伦的理论以外，还接受了十九世纪末广泛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名著《物种起源》即《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竞争中的物种保存》。达尔文主义在反对



宗教上帝说，信仰自然进化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的。所以恩格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列为十九世纪三大发明之一。达尔文认为动植物的变异性是自然界的自然法则。改变了的自然环境乃是变异的主要原因。环境可以双重地影响有机体使它变异，第一可能直接影响整个有机体或它的某一器官；第二可能通过生殖系统影响有机体或它的器官。但他错误地判定“不定的变异似乎只有和有性生殖发生关系”。达尔文最大的缺点在于把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过剩概念应用到总的自然法则里来，把物种内部的斗争当作进化的动力。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立即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他的上述缺点，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起的社会急速分化，饥饿、贫困、无权等都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而是自然界的自然法则。

资本主义农业无论在畜牧还是在作物栽培方面，按达尔文的“性变异”原理，开始用选择的方法来改良旧品种，培育新品种。这种工作当时非常风行。

1900年，德国工业资本家克虏伯(Alfred Krupp)出钱组织一次有奖竞赛，要求竞赛者写论文把达尔文主义的原理应用到德国国内发展和国家的立法上来。多数论文强调了生物学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主张采用选种的方法培育优秀的种族，以此进一步保证国家的发展。获得者是一名叫沙尔迈尔(Wilhelm Schallmeyer)的医生。他的论文对国际法制、科技发展、社会道德、